

## 竟德业·顺自然·除无明

——怀念汤一介先生

陈力川

### 题中秋

他乡故乡共玉盘，  
秋色连波映广寒。  
岁月有情随人老，  
沧海无私任凭栏。

甲午中秋翌日，金丝燕在回巴黎的高速火车上转来乐老师的微信：“老汤已于九月九日晚，九时十五分，离开尘世，归于极乐。”我的心一沉，北京归来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8月27日下午，我和金丝燕从贵阳回到北京，放下行李就去北京大学看望汤先生和乐老师，他们不久前搬到原来季羨林先生住的公寓朗润园13号。“因为是一楼，出入方便些”，见面乐老师说。我们到的时候，汤先生在吃饭，等了一会儿，我们来到他的卧室，汤先生身子倚在枕头上，看到我们进来，语气和缓地问：“我是不是瘦了很多？”一起来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晓萍，可能觉得不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仨人一时语塞。汤先生的表情似乎还在等待一个回答，我急不择言地说：“是瘦了，但汤先生的耳朵显得更大了。”乐老师在一旁笑了，这个曾经那么熟悉的的笑容，我已经很久没看到了，我心里一酸……

我们知道不能打扰汤先生太久，但总要说几句话才能告辞。我想起5月初收到汤先生原来的一个学生发来的照片，北京大学校庆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看望汤一介教授，

照片下有一句附言“总书记牵手儒学大师”。我觉得“牵手”这个词在这里应有另一种含义，回信改为“儒学大师牵手总书记”。我把这件事讲给汤先生听，他没有说话，脸上也没有露出可察觉的表情。其实我心里知道，汤先生关心的不是谁牵谁的手，而是他作为《儒藏》编纂的首席专家，有责任向国家最高领导人介绍这项世纪文化建设的重大工程，争取国家的支持。在这个大前提下，外界如何议论不重要，这符合汤先生儒门三代奉行的“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我本来还想问汤先生对北京大学成立燕京学堂推出“中国学”学科的看法，但是话到嘴边却问不出口。

汤先生请乐老师送我们他刚出版的线装书《儒释道与中国文化》，还有他们一家四口合著的《燕南园往事》。汤先生说要他签名他就签名，乐老师说这次就不签了，我们心照不宣，都没有坚持，汤先生也不坚持。道别出来，乐老师扶着门框，目送我们离去。我看不清乐老师的表情，但此时此刻，我知道她心里想的和我一样：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汤先生了。

转过荷塘望着乐老师的身影，我想起近三十年前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情形。

我第一次去汤先生和乐老师家不是去拜访，而是搬去住的。1985年初，我和金丝燕研究生毕业留校，我留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文学教研室，金丝燕去了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这个所刚成立不久，乐老师任所长，金丝燕和西语系英专研究生毕业的白晓东是比较所的第一批助教。3月上旬，汤先生和乐老师去美国讲学，把他们在中关园的房子借给刚结婚的我们住。这是一个三室一厨的公寓，中间夹着一个小饭厅，采光要靠隔壁厨房的窗户。每个房间里最醒目的就是四壁的书籍，中外文都有，好多还是线装本。汤先生后来说北京大学的藏书是北京大学的“三宝”之一，但他说的北京大学藏书也包括文科老教授们的私人藏书。令他耿耿于怀的是当年胡适的藏书被“打散”，冯友兰，张岱年，王铁崖等北京大学老教授的藏书后来都为清华大学收藏。吴晓铃、张申府去世后，家人曾与北大接触，谈及藏书的问题，但不是没谈成，就是没下文。汤先生还追问洪谦、熊伟、朱光潜、游国恩、周一良等老先生藏书的下落。

最后一次探望汤先生那天，乐老师说他们早已签约将家中两代人的全部藏书捐赠给北京大学，校领导承诺辟出专门的藏书室，供全校师生使用。可一等两年多，校方因没有房子，未能兑现诺言。汤先生病重时，一直牵挂此事，终于将一位副校长请到家中，激动地站起来说，“北京大学说话还算不算话？”这位副校长看到一向心平气和的汤先生病中如此激动，答应立即去办。第二天，校长拍板将未名湖畔新空出来的红三楼全部拨给《儒藏》中心和哲学系儒学院使用，包括汤用彤和汤一介先生的纪念藏书室。汤先生之所以对藏书之事如此在兹念兹，是因为他认为这批老教授的藏书“不

仅是了解这些学者的学术成就甚为重要的材料，而且是了解北京大学文科学术建设和发展历史的重要材料，甚至还可以说是研究中国文化史、学术史的重要材料”<sup>[1]</sup>。

1984年8月，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几名中青年教师得到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等教授的支持，提出成立民间学术机构——“中国文化书院”的建议，同年12月16日举行了全体导师会议，推举梁漱溟先生为院务委员会主席，冯友兰先生为名誉院长，汤一介先生为院长。汤先生去美国短期讲学回来后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批客人，来的最频繁的要数从美国回来的学者陈鼓应和杜维明，他们都是书院聘请的导师。汤先生待客一向不紧不慢，我跟金丝燕帮忙端茶倒水，无意间听到他们谈论最多的好像不是国学问题，而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汤先生将其归纳为三个问题：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接受西方文化？如何创造中国的新文化？可见汤先生思考的是中国文化“反本开新”的问题，这里面既涉及现代与几千年形成的老传统的关系，更涉及现代与近几十年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形成的新传统的关系。当时书院的导师中也分激进派、自由派和保守派，但无论跟谁交谈，汤先生都认真倾听，容纳各种观点，没有门户之见。正是汤先生宽容仁厚的品格使他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拥戴，成为不可多得的学界领袖。在汤先生身上，我们看到蔡元培老校长提倡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后来每每与汤先生谈起何为北京大学传统这个话题，多次听到他强调北京大学的传统是学术自由，要防止有人利用革命的传统、爱国的传统这些堂而皇之的提法抵制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汤先生显然希望知识分子群体自觉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

在汤先生和乐老师家借住的这段时间有两件小事让我们看到温文儒雅的汤先生重情的一面。从美国回来没几天，他给我和金丝燕看他在美国给乐老师选的生日礼物：一串纯金项链和一本莫奈的画册。乐老师的生日是1月份，汤先生借去美国的机会早早把来年的生日礼物准备好了，还得意地拿给我们两个年轻人看，我们都很感动。第二天我拉着金丝燕去了白孔雀艺术世界，给金丝燕买了一个金戒指和一个镀金的项链，还给我自己买了一副铜镇尺，“书存金石气，室有惠兰香”（这副镇尺至今还摆在我的书桌上，戒指和项链金丝燕从未戴过，1994年我们在巴黎的住处被盗，这些东西都不翼而飞了）。

第二件事是5月初，汤先生要去深圳大学参加文化问题协调会，临行前的晚上，他不声不响地买来黄油点心和苹果脯，说要感谢我们这些天对他的照顾，我和金丝燕

[1] 汤一介、乐黛云、汤丹、汤双：《燕南园往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页。

都为汤先生反主为客感到不好意思，更重要的是舍不得他走。汤先生身上有一种书香门第的雍容气度，他刚回来的时候，我们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到他，但毕竟不熟，也因“侵占”了他们的房子颇感局促，所以还有点儿怕他。但很快发现他是一个温厚而沉潜的人，虽不喜应酬，但让人亲近。钱穆先生在《师友杂忆》中说，“锡予（汤先生的父亲汤用彤，字锡予）为人一团和气”。这句话形容汤先生也十分恰当。

### 题新家

前有青竹后有花，  
夏去秋来风四哗。  
身在异乡身是客，  
心存故土心为家。

1986年秋我和金丝燕去国后，跟汤先生和乐老师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中间他们几次来巴黎，我们多次去北京，每次都见面叙谈，时间有长有短。最长一次是2011年12月，我去上海参加一个关于基金会治理的论坛，乐老师让我会后去北京大学为《跨文化对话》丛刊邀请法国汉学家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教授与汤先生的对谈做翻译。两位老先生的对话围绕“中西文化的互补性”展开<sup>[1]</sup>，这次对话使我对汤先生求同存异的能力印象深刻。

谈起中西文化的差异，汪德迈先生认为，由于中西文化对人的理解不同，对人的价值观的理解也就不同。按照西方人文主义的神学传统，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的价值来源于神，因此平等成为西方人文主义最重要的概念，也是西方人权思想和社会契约的基础。按照中国人文主义对人的理解，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位置上，君臣、官民、父子、夫妻、长幼各有自己特殊的身份、地位和义务，他们之间没有平等可言，由此发展出一套社会等级观念。汤先生回应说儒家文化注重的“礼”的确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互有权利和义务的，这从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双向要求中可以看出。再者，原始儒家礼乐并重，而礼和乐又是与仁连在一起的，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问题出在秦汉以后，礼的观念蜕变成三纲六纪，三从四德，变成了礼教，成为一种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在历史的发展中，后来

[1] 见“谈中西文化的互补性”，《跨文化对话》丛刊，第30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29页。

的东西不一定比前面的更好。

汤先生虽然被称为国学大师，但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不乏批判精神。譬如关于人治和法治的问题，汤先生指出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人治的社会而非法治的社会。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和法治之所以如此困难，其文化上的原因是将人情摆在最重要的位置，把人情关系嵌入到制度之中，情大于法，有法不依。而“以修身为本”的理论又过于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自律，忽视了制度制约和他律，因此说西方的理性精神和法治观念对中国有非常重要的互补意义。汤先生显然不认为靠儒家的内圣外王修身养德之说能建立一个现代法治国家。

关于文化融合的问题，汤先生说中国花了一千多年的时间才把印度佛教文化消化到中国自身的文化当中，形成相互影响和补充的儒、道、释三个传统，而且在唐宋以后形成三教合流的趋势。中国吸取西方文化才一百多年，要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根本价值，使其成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还需要花很长时间，反之亦然。但是任何民族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时候，都要立足在自身文化的主体性上面，否则无法了解其他文化的本质价值。汤先生说现在最让他忧心忡忡的就是失去我们文化的主体性。遗憾的是我当时做翻译，没能问他如何定义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与普世价值是互通的，还是抵触的？

### 题古树

树荣影亦荣，  
树枯影不枯。  
化悲化喜处，  
安生安死时。

2000年初，在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FPH）和上海文化出版社的支持下，由乐黛云和金丝燕主编的《远近丛书》面世<sup>[1]</sup>，第一批出版的四本书中有汤先生与法兰西学院院士、地质动力学家李比雄（Xavier Le Pichon）合著的《生死》。在这本并非谈学术而是谈个人体验的小书的结尾，汤先生概述了儒、道、佛三家超越生死的观念和途径：

---

[1] 这是一套中法双语丛书，法文是 *Collection Proches Lointains*，每本书由一位中国作者和一位法国作者就同一主题撰写，突出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个人体验和差异。

儒家的生死观：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道家的生死观：顺应自然，与道同体，苦在自然之未能顺。禅宗的生死观：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苦在无明之未能除。……照我看，儒道佛都不以生死为苦，而以其追求的目标未能达到为“苦”<sup>[1]</sup>。

按照汤先生的这个结论，竟德业、顺自然、除无明是儒道佛三家超越生死的追求。在这条路上，汤先生是苦还是乐呢？我觉得是有苦有乐，但我相信他的乐肯定多于苦。

2014年9月9日（农历八月十六）是我来法国后度过的第二十八个生日，这一天汤先生离开了我们。9月15日汤先生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我们身在海外，未能出席，遗憾的心结至今未能解。我们请好朋友陈越光代行鞠躬礼，请李素茹代送花圈，请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授、汤先生的老友、93岁的书法家杨辛先生代书我和金丝燕拟定的挽联：

荣辱度外不避不逃三代儒士  
有无之间为人为学一介书生

2014年10月3日，于巴黎

**注：**

- 1、本文首发2014年财新《中国改革》月刊第11期，第82—84页。
- 2、本文的三首题诗为作者在汤先生逝世前后所作。

---

[1] 汤一介，李比雄：《生死》，远丛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64—67页。